深入与中国对话

[法]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白丁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罗兰·巴特中心(le Centre Roland-Barthes)主任，著名的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原籍保加利亚人，后入法国籍。1941年7月出生于索非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法语教育和法国文化的熏陶。1963年中学毕业后，入索非亚大学比较文学学院学习。1965年秋，克里斯特娃赴巴黎留学，进入索邦大学和高等实验学校的名师课堂，先后师从戈德曼(Goldman)、巴特、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等社会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大师，深受其影响，并结识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德里达等当代知识名流，不断磨砺、激发自己的创造才思，而在年青学者中初露头角。60年代，她和先锋派小说家、理论家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相识，结为夫妇，使其成为后者所主编的先锋杂志《原样》的一名重要成员，对于这位“异国女子”的学术生涯和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克里斯特娃于1973年在巴黎第八大学通过国家博士论文答辩，从6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学术著作，主要的有《符号学：解析符号学》(1969)、《语言这个未知物》(1969)、《小说文本》(1970)、《疯狂的真理》(1979)、《恐怖的权力》(1980)、《诗歌语言的革命》(1985)、《爱的故事》(1987)、《黑暗的太阳》(1987)、《对我们自己的陌生人》(1991)、《心灵的新疾病》(1993)等，并有小说《武士》(1990)、《老人与狼》(1993)、《占有》(1996)、《拜占廷谋杀案》(2004)出版，在欧美文化界有很高的知名度。

克里斯特娃对中国情有独钟，在其少年时代，她就热爱中国文化，学习过中国文字。到巴黎深造期间，曾在东方语言学院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获中文学士学位。1974年春，她随“原样”作家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发表《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一书，引起西方学界广泛的注意。今年6月我在巴黎访学，曾有幸拜访这位著作等身，热爱中国的学者兼作家，受到了她的热情接待，并将新版的《中国妇女》题赠于我。为使此次访谈有准备、有成效，我曾草拟了几个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先发给她。她在繁忙的研究、写作和学术活动之余，热忱地腾出时间——作了回答。以下的文字便是依据我和克里斯特娃在巴黎首次晤面、交流整理出来的，曾得李金佳博士、陈力川先生、蔡宏宁女士的协助。

白丁：在你众多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探索的著述中，中国主题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比如在你的《中国妇女》、《武士》(*Les Samourais*)中、以及你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表在《原样》杂志上的那些文章。我想知道，在60年代是什么推动你深入了解中国的？

克里斯特娃：虽然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就曾经懵懵懂懂地接触到中国文化，但是，和中国的第一次真正接触应该是在索非亚大学就读的时候。60年代，保加利亚的知识分子格外迷恋异域文化，尤其是我的一个朋友茨维坦·斯托亚诺夫(Tzvetan Stoyanove)，他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儒教和道教的书。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法国定居下来后，我开始渐渐了解这个文化。特别是68年的五月风暴使年青人开始思考能否建立一个兼顾历史文化特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毛泽东就是这样阐述他的构想。通过他的学说，我们很多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也就是这样一种冲动，使我沉浸在牛津大学约瑟夫·内德盎（Joseph Needham）的标志性著作中，去尝试着解读这种神秘的文化。

白丁：菲力普·富雷斯特（Philippe Forest）在其专题论著《<原样>杂志史》中详尽地论及了“原样”派的毛泽东主义，您作为“原样”派的重要成员，对那一时代留下何种记忆？与你后来的知识生涯相较，您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法国的毛泽东主义如某些研究者所言，是一种社会政治乌托邦，您对此有何看法？

克里斯特娃：我无法概括地谈论法国的毛泽东主义，因为在我看来，毛泽东主义涵盖多种价值，具有多面性。其中与我的想法最接近的是《原样》所提到的一面，即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无论是否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些关系都值得探讨。这就是为什么我申请注册了巴黎第七大学的中文本科，并学了4年。我不认为，那只是《原样》的那个年代里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思维方式。在菲力普·索莱尔斯的一本小说《法》(*Lois*)以及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天堂》(*Paradis*)中，意识形态的说法开始出现。在这本书中，道教，以及展现思维方式的道教著作，忽然间出现，闯入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世界中。

白丁：能否这样说，1975年您的大作《中国妇女》的出版，标示着您对中国兴趣的转向。如果说在这之前，您对中国的兴趣首先集中在中国的政治，即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而在这之后，您对中国的兴趣则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和文字等方面。

克里斯特娃：不能说出版《中国妇女》一书标志着我对中国的兴趣回升。其实早在我前往中国旅行之前我就已经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国家。从中国回来，出版书之后，